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论文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一九八五年一月

目 录

前言		1
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永放光芒	王棣章	3
两次伟大的转折 两个伟大的胜利		
一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刘 柯	18
试论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廖惟一 宗锦云	30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方维刚 邵代富 苏文亮	45
党的独立自主发展局面的开创		
	邓麟庆 陈遵海	56
伟大的历史转折 伟大的认识飞跃	耿洪江	66
遵义会议与战略问题	贺志鸿	73
思想解放万岁	夏天一	82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		
	宋洪宪 李恒仁	91
四渡赤水之战与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杜国辉	102
略论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	龚晓红	106
红军与兄弟民族的骨肉情	姜钟彝	117
红军与黔东南苗侗人民		
一纪念红军长征路过黔东南五十周年	陆景川	126

前 言

今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是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遵义会议是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前，党中央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把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党中央和红军被迫退出了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撤消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使党的领导由“左”倾冒险主义转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这里边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不同的分水岭。认真吸取这一

历史经验，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的日子里，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搞好我们的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当前的四化建设服务，为搞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为实现党校的教育正规化服务。为此，我们特选编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论文集”，以纪念遵义会议伟大的功绩。让我们牢记革命的历史经验，奋勇前进。

在选编中，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望予指正。

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永放光芒

王隸章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挽救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二六年的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此，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遵义会议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经验是丰富的，意义是深远的。本文仅就遵义会议创造性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的光辉思想和实践，谈一点

体会。

(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我们党从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解散，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我们党的路线正确与否以及中国革命事业取得的胜利和遭到的挫折，与共产国际都有密切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掀起了以工农为主体的空前的广大人民的解放斗争，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下，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

在这严酷、险恶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我党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85页）一九二七年八月

一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昌南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的任务。继南昌起义之后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它许多地区的起义，我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武装起义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创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与党内的“左”倾错误作斗争，纠正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和瞎指挥的错误，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到一九三三年春，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全国的党员发展到约三十万人，党先后创建了十几个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较快。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诬蔑正确路线是什么“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

机会主义”，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为了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又开展了反对所谓“闽西的罗明路线”和“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他们在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攻失败后，又畏敌如虎，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用所谓“短促突击”去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批评的是乞丐向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在长征初期，在退却中实行逃跑主义，像“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尽管广大红军战士艰苦奋战，先后四次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红军由出发时八万多人，骤减到只有三万人。总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失败，使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并没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形势仍然十分严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仍然主观主义地坚持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这时，蒋介石阻挡我军会合，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进行堵击，真是后有四十多万敌军的尾追袭击，前有十几万重军拦截去路，当时中央红军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主张死拼硬打，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条件下进行决战，红军就有遭覆灭的危险。正是在这危险的时刻，红军向什么地方进军，革命向何处去？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严重问题，它关系到党和

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正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总结了长征以来失败的教训，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相机歼敌。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才避免了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队消灭的危险。红军于十二月占领湖南通道县城以后，向贵州进军，一举攻克黎平。但李德、博古仍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为了更好地解决和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多数同志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同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提出向贵州进军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为了保证战略方针的实现，“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的倾向，（《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决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是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后，我军改向遵义进发，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党和红军争取了主动，混乱现象逐渐克服，作战也比较顺利，部队情绪日益振奋。一九三五年一月突破乌江天险，占领遵义，战局出现了良好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也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领导。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的高级干部以及红军指战员经历了革命胜利与失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了比较，认识加深了。正如恩格斯讲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恩选集》四卷285页）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历史已经表明，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中央红军、中央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领导下，根据地大部分丧失，红军损失惨重，几乎陷于绝境。因此，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严重错误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要求立即结束它在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时，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领导同志，在事实教育下也开始觉悟，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会议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批评了博古“左”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左”倾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张闻天

受会议委托，根据多数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在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部，全权指挥军事。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地位在全党全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的内容充分说明，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说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不是从书本出发，也不是从照搬外国经验出发，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单纯依靠外力，而是充分相信本国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坚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努力，去克服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的，不是在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指导下进行的。这与遵义会议以前纠正陈独秀、

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大不相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近来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必须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号召全体党员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随后又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党的“八·七”会议，就是在他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在纠正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观点，统一了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认识，结束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共产国际先后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随着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国，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决议案，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我党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李立三的错误，“不仅是个别错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错误观点，制定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方针”，是一条与共产国

际“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同时还指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说三中全会“没有在党的面前揭露出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实质”，“采取了模棱两可的、调和的立场，因而纵容了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向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进攻”。（《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其实三中全会的召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会议内容主要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所以要否定三中全会，其目的是为扶持王明宗派集团上台夺取中央领导地位扫清道路。

上述情况说明，在遵义会议之前，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或派代表来华进行的，甚至中共党的有些重要决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起草再翻译成中文的。但遵义会议一反过去的状况，创造性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党内健康力量，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来纠正和克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由我们党自己形成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遵义会在组织上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央重要会议领导人员的产生，几乎都是共产国际支持或批准的。

遵义会议中央领导人员的产生，是我们党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认识到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最大保证，是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重大组织问题的开始，也是抵制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在中国搞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的结果。其重大意义是明显的，正如朱德同志在诗中总结的那样：“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再次，遵义会议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方面，批评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严重错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我们党的重要会议上，公布纠正共产国际的错误，这还是少见的。特别在当时鉴别、判断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标准是“国际路线”，“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情况下，要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周恩来选集》下卷301页）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历史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但也有些错误。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还是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导错误有一定关系甚至有的有很大关系。（当然从党内总结经验来说，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的错误主要特

点，就是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本身，既是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批判，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抵制。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尽管曾一度“成了太上皇”，（《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实际上掌握了中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但他不是象历次纠正党内错误的国际代表那样，以会议的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会议点名批判了他的主要错误，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正如李德后来自己说的“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公开批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最后，遵义会议还独立自主地纠正了错误的党内斗争，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加强党内团结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党一开始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处于幼年阶段，长期战斗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加上共产国际反布哈林“右倾”斗争的影响，党内出现过家长制、惩办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邓小平文选》290

页)党的“八·七”会议后,组织上惩办主义日益滋长,如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被处分。广州起义失败,叶挺被处分。湖南农民起义没有夺取大城市,毛泽东被处分。这些处分都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来的所谓“新”政策,当时党中央盲目照办的。特别是被共产国际誉为“知道列宁主义”、懂得“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的、能“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和自称是“百分之百地绝对忠于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大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凡是对他们“左”倾冒险主义有点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同这种错误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从而使“党更加混乱了”。(《周恩来选集》下卷310页)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是王明等人干的,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周恩来选集》下卷307页)

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斗争的原理,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反对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坚持从实际出发,首先抓住党内主要错误倾向,集中精力解决“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问题,收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在方法上,对犯错误的干部,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摆事实,讲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不是以势压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遵义会议“没有给犯

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这样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2页）从而使党更加兴旺发达。以上这些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下，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进行了有名的四渡赤水的战斗，在作战中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一九三五年二月遵义之战，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光辉战例之一，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三月下旬四渡赤水，接着挥戈南渡乌江，进逼贵阳，乘国民党反动派急调滇军援黔之机，直入云南，巧渡金沙江。从此我军从战略上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在战略转移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

随着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底，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验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